

# 到社会主义之路

奥托·鲍威尔著

(供内部参考)

D143

35

# 到社会主义之路

奥托·鲍威尔著

王志涵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Otto Bauer  
DER WEG ZUM SOZIALISMUS

Verlag der Wiener Volksbuchhandlung  
Ignaz Brand & Co., Wien, 1919  
(143)(3)3K9.5/B320)

根据维也纳伊格纳兹·布兰特人民书店一九一九年德文版译出

到社会主义之路

(奥)奥托·鲍威尔著  
王志涵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新华书店(内部)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1\frac{1}{2}$  · 字数 31,000

1964年7月第1版

1964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2·116 定价(七) 0.23元

印数 0,001—3,000

## 出版者說明

奧托·鮑威爾（一八八二——一九三八年）是所謂“奧地利馬克思主義”的主要理論家，奧地利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右翼領導人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鮑威爾和其他許多社會民主黨人都出任當時奧地利的資產階級政府要職，鮑威爾曾歷任外交部長和社會主義化委員會負責人等。在這以後，他曾多次參加鎮壓工人運動。在法西斯分子上台前夕，鮑威爾同其他社會民主黨叛徒一樣，對法西斯分子百般妥協，使奧地利人民遭受重大的損失。鮑威爾還參與組織了同第三國際對抗的所謂“第二半國際”，並且是這個組織的理論指導者。

“奧地利馬克思主義”這一機會主義流派，有它自己的特點，那就是善於運用馬克思主義詞句來掩飾自己的機會主義本色，手段比較圓滑。鮑威爾是他們之中的一個比較典型的人物。例如，在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上，鮑威爾同其他機會主義分子之干脆否認無產階級專政不同，他並不簡單地否認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而是提出了這樣一個綱領原則，認為應該用民主方式爭取政權，只是在資產階級反抗時，才準備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而在實際行動中，鮑威爾從來沒有進行過無產階級革命的準備。鮑威爾的這種欺騙手法，我們在這本書里也能看得到。

鮑威爾的這本書最初曾在奧地利的《維也納工人報》上以論文形式發表，一九一九年出版單行本。這時，正是十月革命之後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結束，歐洲的一些國家都發生了革命。在奧地利，革命的形勢更加高漲，因為一九一九年在鄰近的匈牙利

成立了苏維埃共和国，革命的火焰已經燒到奧地利國境边上。在这种情况下，正在执政的奧地利社会民主党人不得不作出一些姿态，表示要“实行社会主义”，用以欺騙人民群众。当时成立的以实行局部改良为目的的“社会主义化委员会”就是这种姿态之一，而这本企图为奧地利的人民指出“到社会主义之路”的小册子实际上就是奧地利社会民主党和这个委员会的工作綱領。这种种欺騙手段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根本不提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問題，詭說奧地利社会民主党在政府和議會中占据了多数就已經解决了政权問題，当前奧地利面临的只是改变所有制性质的“社会革命”。而这种社会革命又必須“通过有組織、有計劃的工作，有目的地、稳步前进地、逐漸地”进行，絕對不能使用暴力。鮑威尔在这本书里具体地讲述了他认为应该怎样来进行这种“和平演变”。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通过种种稅收，使资本家和地主的生產資料逐步轉化为国家所有。尽管他用了“剝夺”、“革命”等字样来掩护，实际上非常明显，这是一种根本不可能的幻想。列宁曾在《政論家短評》（《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卷第326—330頁）中对他的这种謬論进行过尖銳的批評和辛辣的嘲諷。列宁指出，用这种“調节”和“調整”的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抽象地說，这种过渡无疑对“人民”是最有利的）的前提是，无产阶级胜利已經絕對巩固，资本家的处境已絕對沒有希望，资本家已絕對必須并願意老老实实地服从”，而鮑威尔在资产阶级实际上还在当权的情况下宣揚这一主張，无疑是在为资产阶级效劳。事实上，鮑威尔等奧地利机会主义者这次也的确給资产阶级帮了大忙：正是由于他們的叛卖行为，使奧地利的大好革命形势断送得一干二淨。

本书据維也納伊格納茲·布兰特人民书店一九一九年德文版譯出。原文書的頁次現在排印在譯本頁边空白处，以便讀者查核原文。

## 目 录

一	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	1
二	大工业企业的公有化	6
三	工业企业的組織工作	10
四	工人委员会	14
五	大地产的公有化	17
六	个体农民經濟的社会主义化	21
七	住宅用地和家务的社会主义化	26
八	銀行的公有化	29
九	剝夺剝夺者	32
十	社会主义化的先决条件	35

## 一 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

2

政治革命推翻了皇室、消除了貴族院、粉碎了存在于各邦和各行政区的特权选举制度。一切政治特权都被鏟除了。全国公民，不分階級、出身、性別，現在都是享有同等权利的公民。

但是，政治革命只是革命事业的一半。它消除了政治上的压迫，可是并没有終止經濟的剝削。資本家和工人——他們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他們享有同等政治权利，但是資本家仍然是資本家，工人仍然是工人；这一些人仍然是工厂或矿場的主人，那一些人仍然像教堂老鼠似的赤貧而无保障。

政治革命沒有消除經濟剝削，毋宁說倒使經濟剝削更加露骨了。我們推翻了皇帝的无上权威，难道是为了繼續屈服于資本主义的无上权威嗎？我們粉碎了將軍們、官僚、封建主的統治，难道是为了繼續充当銀行經理、卡特尔巨头、交易所投机家的奴僕嗎？工人群众提出了这样的問題。一半的革命事业喚醒了完成整个革命的意願。政治的革命喚醒了走向社会主义新秩序的意願。民主主义的胜利揭开了爭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序幕。

民主主义在中欧的胜利是战争的結果，是中欧同盟国战败的后果。战争粉碎了作为两个軍国主义专制政权力工具的軍隊，剝夺了专制国家的强制工具，因而导致民主主义的胜利。但是这次的战争也招致了巨大的經濟变化；这种变化使社会主义成了一种不可避免的必要性。

在四年半之久的期間中，各族人民都沒有建造住屋，而只挖掘了战壕；沒有制造机器，而只生产了炮彈和开花彈；沒有从事耕种，

而只操纵了大炮。我們的耕地缺乏肥料，我們的机器已經耗損，我們的铁路因失修而損坏，我們的衣着和日用布制品已变成襤褸破布——社会的所有財富遭到了毀灭。各族人民經過战争都变貧困了，不可言状地貧困了。

各族人民都成了貧困的人民，可是中欧各族人民貧困的情况比所有其他各族人民尤为严重。因为我們是战敗者。我們必須向  
3 战胜者賠償他們的战争損失，繳納貢款。尽管我們貧穷到这种地步，我們還必須在貧困的处境中向他們——战胜者支付巨額稅款！

我們要工作。但是我們为什么而工作呢？首先，我們要清除荒蕪了的田地上的野草，要制造新的机器以代替耗損了的机器，要修复已遭破坏的铁路。然后，我們必須为生产商品而工作，我們就用这种商品向战胜者繳納貢款。我們在这样情况下，还能有足够的剩余劳动力来生产一定数量的粮食、衣服、日用布制品和住宅等等以滿足我們自己的需要嗎？

我們变得貧穷了，不可言状地貧穷了。在这样貧困的情况下，我們还能作这种奢举，即用我們劳动所得向那些脑滿腸肥的教長們、不可一世的伯爵們、驕奢淫佚的发战争財的富豪們、閑散懶惰的地主和高利貸者繳納貢款嗎？变得如此貧困的人民还能忍受这样不平等地来分割他們寥寥无几的劳动所得嗎？

我們貧困得已經担当不起資本家和地主来分割我們的劳动所得了。通过战争賠款的形式向外国資本家納貢，已經够糟糕的了。我們不能另外又負担向国内資本家进貢的义务。在我們經濟困难中所能找到的唯一出路，沒有別的，只有：社会主义！战争既然把民主主义导向胜利，它也会迫使我們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但是我們如何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新秩序呢？我們如何才能使那些今天还屬於資本家和地主的工厂和矿場、森林和耕地以及广大的土地和資本成为人民公有的財產呢？



政治革命可能是一日之間可以完成的事业。以共和国来代替专制政权，以权利平等来代替寡头特权——这一向都是在一个偉大的时刻突然地一举成功的。有些人认为社会的变革也能像政治革命那样迅速和突然地完成。有那么一天，工人就会一下子占有了所有的工厂、矿場、企业、銀行和农庄，并且把资本家和他們的經理們轰走了事；这样的话，那么早晨还属于资本家和地主的财产，晚上就成了劳动人民的财产了。事情真的能够这样发展嗎？社会革命真的能够这样迅速和简单地实现嗎？

和我們的幸福密切关联的有两件事情：第一，整个国家究竟**生产**多少财富；第二，财富是如何**分配**給社会各階級的人民的。社会主义必須首先改变财富分配的形式。今天，一个继承“父亲大人”财产的懶惰资本家从整个财富中得到的分配量要比一个勤劳干练的工人所得到的多得多。这种差别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允許存在的。但是，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也不能按照平均主义方法来分配财富。对于勤劳的人要比懶惰的人給予較好的报酬；不然的話，就不会有更多的人願意勤劳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对那些改进工作方法的发明家以及那些为国民經济指出新途徑的人，比对那些不費思索而只完成日常工作的人所給予的待遇当然要較为优越；不然的話，就不会有更多的人努力改进工作方法了。只有对社会的真正贡献才能享受多分社会劳动果实的权利，而不是由那些世襲地产和毫无顾忌地攫取得来的资本享受这种权利。所以說，社会主义要首先改变整个财富的**分配**制度。但是在改变分配制度的同时，必須不減縮**财富生产**才能有益于劳动人民群眾。因为，假使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中，所生产的财富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所生产的财富的一半，那么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工人生活絕不会好轉，也許甚至比在资本主义統治下的生活更坏得多，这就是說，如果可分配的财富减少了，即便是最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也是无济于事的。因

此，社会主义在这方面的职责是：必須在不使财富生产受到影响的情况下进行公平合理的财富分配！

我們变得赤貧了。由于我們整个生产机器的耗損，由于缺乏原料，由于缺乏营养所造成的体力衰弱，我們所生产的财富比战前縮減了許多。但是，生产减少，当然消費也随之减少。也就是說，社会的劳动果实越少，社会所拥有的财富量越少，那么即使采用最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分配到每个人手上的财富也越少，每个人能够消費和享受的财富也越少。在这样的時候，我們必須注意到：任何行动不得导致生产机器的更加破坏、原料来源的更加困难、财富生产的更加縮減，以及我們的劳动总产量的更加减少。我們的貧困迫使我們进行較為合理的财富分配，但是貧困也迫使我們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貫徹这种变革。

如果我們現在想像一下，突然一天，工人們用暴力占有了所有企业，他們直截了当地轰走資本家、資本家的經理和管理人員，并且他們自己掌管了企业的領導权，那这种变革当然只能在流血的內战中才可能实现；但是，內战会不可避免地破坏大量的生产資料、机器、铁路材料等等；不言而喻，我們如此破烂不堪的生产机器又要遭到严重的破坏。資本主义的外国将拒絕對我們提供我們所迫切需要的原料和我們用以购买原料的信用貸款，美国和協約国将保持对我国的封鎖；我們的企业将由于缺乏原料而繼續停閉。那些在資本主义社会具有領導企业的必要知識的大多数經理、工程师、化学家、农庄管理員、技术員、企业職員以及各种商业部門的職員将拒絶和我們合作；难道工人自己就能找到原料的来源，就能組織現代化大企业的复杂工作嗎？在大企业工作的工人所承当的只不过是工作的某一部分，所以他們所能理解的，也只是工作的某一部分罢了。至于工人本身，他們受到內战慘痛打击的影响，既沒有搞工作的安定心情，也沒有搞工作的意向；工作的效率势必大大

下降。所有这些现象的结果，不外就是所生产的财富比现在还要少得多。不错，财富的分配比从前合理了，即使如此，每个工人的所得并不能增多，或者甚至比现在所能得到的还会更加减少，其原因就在于生产的财富减少了，所以财富的分配量也就必然随之减少。希望通过社会主义来改善处境的人民，面对这种事实会感到很大的失望，这种失望可能会驱使他們投向资本主义反革命的怀抱。

所以我们不能通过这种方式走向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开辟别的途径。我们必须通过有组织有计划的工作，有目的地、稳步地、逐渐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任何一种引导我們走向社会主义的措施，都必须经过再三思考；这种措施不只是为了照顾到财富的合理分配，也要照顾到财富生产的改进；除非能同时建立起社会主义的财富生产的组织结构，不然不得破坏资本主义财富生产的组织结构。并且社会主义的这类组织结构，其完善程度至少也要不亚于资本主义同样的组织结构。政治革命是暴力所能完成的事业；社会革命只能通过建设和组织工作才能完成。政治革命是几小时中所能完成的工作，社会革命却是勇敢地、深思熟虑地进行多年工作的成果。这种见解是和昨天或前天的肤浅的修正主义或改良主义的妄想绝不相干的。修正主义或改良主义认为，根本不需要暴力革命，社会即可能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种说法当然是错误的，因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乃是社会革命的先决条件；而且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从前是、今天仍然是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才能实现的。如果已经夺取了政权，那么无产阶级所负的使命就是一个全新的任务，完成这个新任务就不是革命的手段所能胜任的了。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政治革命永远只能是“为未来社会基本要素扫清道路”。在这种基本要素的基础上建设新社会正是这样一种任务，它不能通过巷战的方式，也不能通过内战的方式，而只能通过创造性的立法工作和管理工作来完成。

## 二 大工业企业的公有化

国民經济的社会主义化必須从重工业着手：煤矿、金属矿和鋼铁工业必須首先成为公有化企业。这些都是最容易社会主义化的工业部門；因为这些部門的生产早已集中在不多几家大企业，所以容易**集中领导**。同时，这些也是最迫切需要社会主义化的工业部門，因为，誰拥有煤和铁，誰就能統治整个工业。

我們用**剝夺**的方式来开展社会主义化：国家用法律宣布重工业企业的所有权为无效。但对原业主必須**补偿損失**；因为，如果所有其他資本家仍然保持他們的所有权，而独独剝夺了煤矿或炼铁厂股东的所有权，是不公平的。但是，国家补偿重工业原业主的款項要由所有資本家和地主来共同負担。为了这一目的，国家向所有資本家和地主征收累进**财产稅**，利用这种稅收来补偿重工业企业股票持有人由于企业被剝夺而受到的損失。对企业被剝夺的股票持有人來說，这种办法并没有什么不合理，因为他們的企业是通过十足清償的办法出手的，至于他們在財富方面所損失的部分則与所有其他資本家因交财产稅所損失的部分完全相同。劳动人民于是毫无損失地获得了重工业的所有权，因为支付补偿款項的并不是劳动人民，而是資本家。

那么什么人應該管理公有化企业呢？政府嗎？絕對不是的！如果政府管理了所有的企业，它的权力势必超过人民的权力和人民代表會議的权力；政府权力这样的增长，对民主制度可能是一种危險。另外，政府也不会管好公有化企业；最坏的企业管理者莫过于国家本身了。所以，我們社会民主党人永远不要求企业国有化，而只要求企业公有化。但是，既然政府不适于作这项工作，那么究

竟應該由什麼人來領導公有化企業呢？

今天的大工業企業是由股東選出的管理委員會掌握的，將來每一個公有化工業部門也都要由一個管理委員會來領導，但是這個管理委員會就不再是通過資本家的選舉產生出來的了，而是由這樣一些社會階層的代表選舉出來，這些社會階層的物质需要將來要由這個社會主義化工業部門來滿足。那麼什麼人最關心這個社會主義化的工業部門的管理呢？第一是那些在社會主義化工業部門工作的**工人、職員和公務人員** (Beamte)；第二是消費該工業部門產品的**消費者**；第三就是代表全民的**國家當局**。因此，每一個公有化工業部門的管理委員會大致都將按照以下情況組成：管理委員會成員的三分之一是由該企業工作人員的工會組織和職員組織共同推舉的。第二個三分之一是消費者的代表。例如煤炭企業管理委員會的消費者代表，其中一部分代表是代表消費合作社的，作為消費煤炭的一般住戶的代表，其中另一部分代表是代表消費工業用煤的企業組織的代表。管理委員會成員的第三個三分之一是國家的代表。一部分國家代表是由財政部長指定的，作為國家財富的代表者，另一部分是由國民會議選出的，作為一般國民經濟利益的代表者。工人和職員的代表為一方，消費者代表為另一方，他們雙方之間存在着利益的矛盾；因為，那一方希望有較高的工資，這一方希望有較低廉的煤價。國家的代表者作為居間人，在雙方之間發揮仲裁作用。

通過上述方式組成的管理委員會承擔這個工業部門的最高領導職責：領導人的任用、售價的規定、與職工會訂立集體合同、盈餘的分配以及重要投資的決定等等。另外，也有必要制訂特殊規定，以預防管理委員會由於徇私或政治動機在任用領導人時發生偏差。並且必須選用最能幹的技術人員、工程師、化學家。為此，可以作出以下最現實的安排：高等科技院校的教員組織和所有工業

方面的技术领导人应共同組成審議會；該会在委任每一公有化工业企业技术领导人之前应預先提出建議；有关的工业企业的管理委员会然后从所推荐人选中選擇任用。正像現在教育部根据教授委员会議的建議聘請教授一样，管理委员会也要根据由全国科技领导人組成的審議会的建議来聘任公有化工业企业的經理。将来也同現在一样，技术方面的和业务方面的职员，在通过如上方式任用的經理的监督之下，进行企业的管理工作；在管理机构中，無論如何也要避免发生官僚主义。

至于工人委员会在各个企业中究竟通过什么方式来参加管理工作，容待后文討論。

公有化具有双重目的：一方面，要改善在公有化企业中工作的工人和职员的生活；另一方面，要把一向只流入資本家私囊的企业收入提供全民应用。因此，必須談一談如何分配公有化企业部門盈余的問題。每年必須把盈余一部分用于該企业部門生产机器的充实和改善方面，这是理所当然的。盈余的其余部分，应分配給国家和在該企业服务的职工这两方面。所有在公有化企业工作的人员都有分享一部分盈余的权利，这样才能提高他們的工作热情和劳动强度。

通过这种方式来貫徹重工业公有化的措施将有益于全民。它为国家增加了收益，但没有增加消費者的負担；对在重工业服务的职工，既保证他們有权参加企业管理，又保证他們有分享企业盈余的权利；并賦予煤铁消費者能够影响煤铁生产的权利。这一切都不是阻碍工业技术前进，而是提高劳动强度的手段，因而生产費用也将降低。

但是这样的公有化方式并不适用于所有企业部門。对某些工业部門，我們將用別种方式来处理：国家剝夺某些工业企业的私有权之后，再把它們出租給消費合作社的大型收购公司或农业合作

社的联合組織。譬如，国家可以把制皂和制蜡厂出租給消費合作社，把化肥厂出租給农业合作社。在合同上不只注明承租的消費合作社应当将固定的租費上繳国庫，也注明对服务于出租企业的职工既要保证他們有参加企业管理的权利，也要保证他們有分享盈余的利益。

另外还有一些工业企业宜于通过专区和市政府来实行公有化。国家赋予专区和市政府代表——当然，这是通过普选产生的代表——一种权力，他們可以把那些专为地方的需要进行生产的工业企业划归地方公有。例如电車、輕便铁路、运输車輛等工业企业，发电厂、面粉厂、牛奶場、酿酒厂、磚瓦厂以及其他类似的企业等。对这些企业的原业主实行补偿損失的办法当然又不同于通过国家实行公有化的办法了。因为，地方政府沒有征稅的权力，如果地方政府仿照通过国家实行公有化的补偿办法行事，那么属于地方所有的資金势必外流。因此，国家指令这类原业主必須接受作为补偿損失的业主证书，用以证明业主有从公有化企业的收益中支取定息的权利。专区和市政府有权决定偿付这种債務的年限，在二十年内或三十年内付清。这种限期屆滿之后，划归地方政府公有的企业就不再对私人資本承担任何付給定息的义务了。

上述办法的公有化方式，可应用于許多工业企业部門。但是也还有許多工业部門实行社会主义化根本还不成熟。我們对这类企业暂时还不能实施社会主义化，必須先进行組織工作，以便为将来实行公有化作好准备。

个别商业部門也可用类似对待各种工业企业的办法实行公有化。譬如，等世界市場恢复正常情况之后，国家也可以对經營咖啡、可可、茶、棉花等商业企业实行公有化措施。經管国内煤炭工业的管理委员会，也可以接受国家的委托，管理进口煤炭的业务。国家也可以付給地方政府权力，把大百貨公司划归地方公有和

收某些資本主义商业企业，例如，畜类貿易行就應該强制接收。

### 三 工业企业的組織工作

只有那些生产集中于几个由股份分司掌握的企业的大工业，立即实行公有化的条件已經成熟。大多数的工业部門都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如果某項工业还分散在許多中小型企业中，这就不可能对它实行公有化措施，也就是說，这种工业还不能由一个中心来領導。在一个企业中，只要它的技术和业务不是由經理或管理人員而是由业主本身来領導的，那么就不能让业主脱离企业，否則会由于沒有內行的領導者而不利于生产。因此，我們不能立即对大多数的工业部門实行公有化，而是首先要对它們进行組織，以便为未来的公有化工作作好有目的的准备。

企业主自己早就看到对工业进行組織的必要性。为了这一目的，他們联合起来成立卡特尔。卡特尔消除了企业主之間的竞争，因此节省了大宗不必要的竞争費用(如广告費、行商費等)。他們把售貨交易集中在卡特尔的办公室，买卖商人也成了卡特尔办公室的代理商，因此，商业資本的实力和利潤受到了显著的限制。最后，他們規定了生产的范围，并且划分了各企业的生产任务。通过上述办法可以使生产适应动荡不定的市場需要，因而可以避免經濟危机，或者最低限度，也能起緩和經濟危机的作用。虽然，卡特尔通过这种方式表现出較多好处，但是对社会來說，却是很大的損失，因为，卡特尔惊人地加强了工业資本势力，既加强了反对消費者的势力，也加强了反对工业工人的势力。組織起来的資本势力强使消費者承受高昂的价格和非常巨大的剝削，成了与工业工人相对立的占优势地位的敌人。



在战争时期也产生了新的工业组织机构：如德国的战时公司，奥地利的中心站和战时联合组织等。这些设施也曾起了有利的作用。由于实行对消费的强迫限制以及由于有计划的物资分配，保持了较低的物价，如果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上述现象是不可能出现的。但是，即使如此，这也是社会的莫大损失：某些中心站不外就是由国家组织的强迫性的卡特尔，譬如煤油中心站就是这样的一种。其他中心站不外都是一些军事管理机构的征用工具，譬如棉花中心站。 10

我们今天所负的任务并不是要整个地破坏工业组织而转向毫无约束的自由竞争，现在已经没有回转到曼彻斯特自由主义——自由竞争主义——的余地了，尽管像基督教社会党这一类党派，它们早年虽然曾向曼彻斯特自由主义作过斗争，并且是在这种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而现在自己却成了“自由贸易”主义的崇拜者。今天的问题不在于消除工业组织，而只在于如何建立为全民需要服务的工业组织去代替资本主义的工业组织。只要卡特尔和中心站有利于国民经济，未来的工业组织也有必要起这种的作用；但是，它们所起的不再是如卡特尔为资本的利益服务的作用，也不是如中心站为军国主义的利益服务的作用，而是起为全民利益服务的作用。

为了这一目的，应责成所有工业部门的企业隶属于各该部门的联合组织；由各工业联合组织代替各卡特尔和中心站执行权力。但是，工业联合组织不能同卡特尔一样受企业主的控制，也不能同中心站一样听从没有管理经济事务能力的官僚主义者的领导。工业联合会须由社会各阶层的代表人物组成的管理委员会来领导，组织起来的工业部门的管理机构应该为这些社会阶层的利益服务。这就是说，每一个工业部门的联合组织都要由一个管理委员会来领导，它大致可通过以下的办法组成：管理委员会成员的四分之